佳肴佳句总难忘

——略说汪曾祺与舒婷的一面之缘

□ 金实秋

舒婷是当代朦胧诗代表作家之一,时与北岛、顾城齐名,其诗《致橡树》《双桅船》等佳作风靡诗苑,散文集《心烟》《秋天的情结》等也誉满文坛。汪曾祺与她见面时,汪老已是古稀之年,而舒婷则风华正茂也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汪曾祺与林斤澜一起兼任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,时于该院工作的何镇邦曾于1989年12月邀汪、林二老福建一游。汪老此行甚欢,回京不久即写了《初访福建》,文末标写作时间为:“庚午年正月初四”。在这篇文章中,汪先生记叙他在厦门去了两个地方:一个是著名古刹南普陀寺,一个是诗人寓所舒婷的家。涉舒婷文仅一百余字:“舒婷家在一山坡上,是一座石筑的楼房。看起来很舒服,但并不宽敞。她上有公婆,下有幼子,她需要料理家务,有客人来,还要下厨做饭。她住的地方,鼓浪屿,名声在外,一定时常有些省内外作家不速而来,像我们几个,来吃她一顿菜包春卷。她的书房不大,满壁图书,她和爱人写字的桌子都只是两张并排放着的小三屉桌,于是经常发生彼此的稿纸越界的纠纷。我看这两张小三屉桌,不禁想起弗金尼·沃尔芙的《一间自己的屋子》。舒婷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写得出朦胧诗么?听说她的诗要变,会变成什么样子?”字里行间,对舒婷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那天去舒婷家的,还有林斤澜。汪、林二老乃文坛酒仙,舒婷亦能小酌几杯。二老难得到福建,也都是第一次至舒婷家,舒婷焉能无酒以待?然汪老文中仅提到“菜包春卷”,只字未写到“酒”,岂不怪哉?!其实,那天舒婷是有酒奉客的,只不过酒实在有点怪,可能是汪老故意避而不谈罢了。在一次江南的文学活动中,舒婷与林斤澜、张抗抗、徐卓人一起用餐,席间闲聊到鼓浪屿的酒。林斤澜说那里的茅台酒有股耗子屎的味道。徐卓人不解,林老哈哈大笑,遂抖出了那天在舒婷家喝酒的事儿。他说:“一次在鼓浪屿开会,舒婷邀我和曾祺两个上她家喝酒,酒的品种不少,牌子也不错,但没一个瓶是原封的。接待客人,开了瓶,客人走了,剩下的酒重新盖起来,存在那儿,她(舒婷)不喝,她家里也没一个喝酒的,这酒一存也不知存了多久,哪里还是原来的味儿?”徐卓人追问:“那你哥俩还喝?”林先生眼一楞:“喝,不喝又怎么办?”此事见徐卓人《酒逢知己》,非余杜撰妄言也!从中亦可见汪、林二老随和宽厚,舒婷待客疏忽之一斑矣。

汪老文中虽未言酒,但未忘却写上在舒婷家品尝的一道美食“菜包春卷”。不过,此“菜包春卷”乃汪老所命名,当地人谓之“薄饼”,正宗菜名则曰“厦门薄饼”,系厦门的地

方名点;用猪五花肉、虾仁、冬笋、豌豆苗、胡萝卜、豆干等多种食材为馅,以春卷皮包之。另据何振邦言,“这次宴请名义上是舒婷请,其实一桌子富于鼓浪屿风味的美味佳肴均为舒婷婆婆所烹制。”(何镇邦《汪曾祺林斤澜的福建之行》)但不管是舒婷执勺,还是她婆婆掌厨,汪老对那一桌子菜显然是留下了美好印象的。从福建回北京不久,他还着手主编《知味集》,亲撰信函分发四十多位作家撰写美食散文入编,舒婷应邀提供了《面包祭》一文。此书乃汪曾祺先生主编的唯一一本散文集,1990年于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,“人间送小温”,此亦汪先生之遗泽也!

顺便提一下,汪、林二老在舒婷家小聚,女诗人也留下了美好印象。一次,一位喜好诗歌的将军访问舒婷时,她不无得意地告诉将军,汪曾祺老先生夸奖她厨艺不错。将军说,汪老是个美食家,文章也写得好,每次读汪老的书总是不舍得放下。

佳肴说罢说佳句吧。其实,在汪老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是舒婷的佳句。1987年8月底,汪先生应安格尔、聂华苓邀请至美国爱荷华参加“国际写作计划”,途经香港之际,与女作家舒非闲聊,在谈及“语言文字鲜活考究”时,他老先生脱口而出便引用了舒婷散文中的佳句。舒非在《汪曾祺侧写》中写道:“汪老说舒婷的散文也不错,比如她写夏夜,说‘踩熄了一路虫声’,某某则不,说:‘虫叫被脚步声吓跑了。’”

汪曾祺与舒婷一老一中均为当代文坛“大咖”,其时在一起开会、活动的机会自然不少,然笔者所知他们两位的交谊仅此“一面之缘”,惜哉!

有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。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,每蕾皆一旗一枪,泡在玻璃杯里,茶叶皆直立不倒,载浮载沉,茶色颇淡,但入口香浓,直透脏腑,真是好茶!只是太贵了。一杯茶,一块大洋,比吃一顿饭还贵。狮峰茶名不虚传,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。

汪曾祺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。碧螺春真是好,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,他觉得有点煞风景。后来他问陆文夫,陆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。茶极细,器极粗,亦怪!

汪曾祺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。茶叶、老姜、芝麻、米,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,用硬木的擂棒“擂”成细末,用开水冲开,便是擂茶。

日本有茶粥,《俳人的食物》说俳人小聚,食物极简单,但“唯茶粥一品,万不可少”。茶粥是啥样的呢?汪曾祺曾用粗茶叶煎汁,加大米熬粥,自以为这便是“茶粥”了。有一阵子,他每天早起喝他所发明的茶粥,自以为很好喝。

谈到喝茶的习惯,汪曾祺先生说:“我喝茶,纯粹解渴和恋上茶的味儿,如若非得有个专业的茶道知识,我也只能旁听插不上话。可我就偏好这口,喝茶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,与其说是习惯,不如说我对茶有依恋的情怀。中国人创造性的把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,更是历经千年发展让自己的生活离不开茶。”又说“真实的生活终究是充满烟火气息的,遇到了茶,忙碌的生活有了一束光,流浪的脚步有了停顿,平淡的生活有了流光烟火。”

近有个农贸市场。好些山民把山上挖的东西摆在地摊上卖,一个老太面前摆个口袋,里面装了好多像树根一样的东西,上面沾满了红色的泥巴。这是什么东西?我好奇地问了一下,她告诉我,我听不懂,后来别人说了我才知道是当地特产生物药材大草乌。

个旧是中国锡工业基地。我去云锡个旧选矿厂办事。这个厂是近百年老厂,是我国第一座使用机械化生产的重力选矿厂。车间里面一条边的摇床,地上湿漉漉的,隆隆的机器声中,工人穿着高帮胶靴在摇床周边忙碌着。厂区院子里矗立着一座德国人建造的钟楼,石砌墙体,颜色和地面的红土一样,共三层,正方形,攒尖顶。上面的钟不知道哪年已经停摆了。

我坐在个旧开往昆明的大巴上,望着窗外的美景,想起巴金先生在《个旧的春天》一文中的几句话:我离开个旧的时候,太阳已经升到老阴山的上空,金湖给照得像一大片发光的明珠。我刚刚爱上了这个地方,怎么能毫无留恋地离开呢?

汪曾祺与茶

□ 姚维儒

汪曾祺喝了一辈子的茶,却谦虚地说:“对茶实在是个外行。茶是喝的,而且喝得很勤,一天换三次叶子。每天起来第一件事,便是坐水,沏茶。但是毫不讲究。对茶叶不挑剔。青茶、绿茶、花茶、红茶、沱茶、乌龙茶,但有便喝。茶叶多是别人送的,喝完了一筒,再开一筒。”有人认为喝茶只是“止渴生津利小便”,汪曾祺以为还有一种功能:提神。

汪先生喝茶是喝得很醇的。曾在机关开会,有女同志尝了他的一口茶,说是“跟药一样”。汪先生喝茶浓醇,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。祖父汪嘉勋喝茶考究,大多喝龙井,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,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。他喝茶喝得很醇,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。喝得很慢,喝一口,还得回味一下。汪先生后来到了外面,有时喝到龙井茶,就会想起他的祖父。

汪曾祺这一辈子喝茶印象最深的有几次:

1946年冬,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。饭后,汪曾祺和靳以、黄裳几个人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。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,看陈蕴珍(萧珊)“表演”:濯器、炭灰、注水、淋壶、筛茶。每人喝了三小杯。汪先生第一次喝功夫茶,印象深刻。

1947年春,汪曾祺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。除了“西湖景”,还

从古至今,作家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汪曾祺先生是文坛有名的茶客,他最值得回忆的时光,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喝茶清闲之时。他的《泡茶馆》,完全凭记忆追忆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校门口的一系列茶馆,及其布置风格的区别。昆明茶室,有大茶楼、小店铺之分,汪先生那时是一介穷书生,喝不起好茶,只能邀二三学子或同道,在昆明小茶店里抒发文人情愫。

汪曾祺大学二年级那一年,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一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,各自看自己的书,有时整整坐一上午,彼此不交语。他那时开始写作,最初几篇小说就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。

“泡茶馆”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,本地人叫做“坐茶馆”。“坐”,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,“泡”则更胜一筹,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。联大学生上茶馆,并不是穷泡,除了瞎聊,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。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,宿舍里没有桌凳,看书多半在茶馆里。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。不少人的论文、读书报告,都是在茶馆写的。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《哲学概论》期终考试,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。

汪曾祺说他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,接触各种各样的人,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会让他发生兴趣,都想了解了解。“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,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。”后来,汪曾祺创作了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,写出妇孺皆知的阿庆嫂所开的春来茶馆,阿庆嫂唱得好: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。来的都是客,全凭嘴一张……”

2001春天,我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。该市坐落在红河北岸,距昆明280公里,是一个西南边陲小城。

小城四面环山,以东、西两面的老阴山、老阳山为最高。山上树木苍翠,郁郁葱葱。市中心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,俨如小城镶嵌的一颗璀璨晶莹的明珠。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金湖,当地人习惯称为个旧湖。金湖面积不大,湖边是人行步道,两边栽种了各种花草树木,早晚在人行步道上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。清晨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沿湖边人行步道走了一圈,大约用了一个小时。整个城市环绕金湖四周建在山脚下面。出门打的,无论到城里什么地方,收费5元。人们出行主要靠步行或乘公交车。

城市街道干干净净。沿街的铺面,没有多少台阶,进出比较方便。建在街道后面的房子,从家门口到街道上,要经过巷子台阶上下。有的地方没有台阶,只有陡坡,路边有铁管扶手,当地人不用扶手就能上下。

美丽的个旧城

□ 张福勳

有一天中午,到当地人家做客。好客的主人烧了一桌子的菜,知道我们不吃辣,有的菜里面只放了草果和桂皮之类的调味料。又拿出一大瓶珍藏多年的白酒,里面泡着一只癞蛤蟆,看样子有点瘆人。感情难却,我喝了一小杯,口感不错,就是后劲大,下午半天头都昏昏沉沉的。

个旧人爱喝酒。有人成了酒仙,一天四顿饭,除了早中晚以外,吃夜宵也喝酒。这里吃夜宵如同我们在家吃早晚茶,再平常不过了。当地的饭店和烧烤店多,有店铺,还有大排档。吃的食材稀奇得很,粉红色的鲜花花瓣,近寸把长的白色竹蛆。鸡腰子烧汤,装在小罐子里,上面飘着葱花,10元钱一对。

我住在金湖东路的云锡第二招待所。附

《戴车匠》的烟火氛围

□ 汪泰

《戴车匠》是汪曾祺先生以自家邻居为原型写的一篇小说。这篇小说,突出了汪先生用散文笔法写小说的特点,不重情节重情调,抒情白描景物人事。

小说从第三小节起,用了四百多字写戴车匠家的左邻右舍:侯家银匠店和杨家香店。描述了侯银匠的谋生手段,制作银器出租花轿。对花轿描写的具体程度和篇幅,比《侯银匠》一文中的花轿篇幅还长。杨家香店的特色是柜前立着一块匾,匾上那幅“鹤鹿同春”的画,还有他家为方便四邻每天一盆稀稀的浆糊。汪先生并说:我小时糊风箏常去寻过浆糊。

介绍了戴家的左邻右舍后,才开始介绍戴家的情况:门店,对子,木制车床和工作间。

为什么汪先生在写戴车匠家之前要介绍戴家的左邻右舍呢?一段似与主题不太搭界的描写,没有这一小节,似乎也不影响正文,那么这一节是不是就可有可无呢?

汪先生的许多作品中,对看似与主题没有关联的景物人事常有涉及,有时甚至是大段的描写。

汪曾祺认为“小说是回忆”,《戴车匠》描写的是故人往事,是民间百姓生存的真实状态,是小城民俗和市井生活场景,是现代文明还未充分渗入到的地方保留着的一点古风,是作者对民间凡俗人生的感悟与启迪。汪先生平时留意这些内容,乐于描写这些内容,显示出他对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关心,并刻意营造出某种社会状态的氛围,也只有有了这些左邻右舍的描写,才能让人觉得这戴车匠家的生存环境是真实存在的,这种环境下的文化习俗、景物人事才是和谐的、安详的、安宁的,是一种合理的存在,才会觉得这样的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,是为了烘托出戴车匠家及其周边的烟火氛围。没有这样的描写,倒显得戴车匠家的存在是单调、不丰满的。

重视情节就是重视叙事模式。汪先生的作品却不受情节的羁绊,他提出“气氛即人物”的观点。因此,描写氛围情趣,是他小说的文体特点。他的好些作品的开头,有大段的关于环境、风物、风俗、典故的描写,在不经意中,把读者带进他刻意设计的韵味中去。如上面提到的对戴家左邻右舍的描写,又如对戴车匠的工具的描写,工作场所的描写,产品的描写,让读者感觉到戴车匠是一个严谨的、心灵手巧的、热爱自己工作的人。看这样一段描写:“戴车匠蹑脚踏板,执刀就料,旋刀轻轻地吟叫着,吐出细细的木花。木花如书带草,如韭菜叶,如番瓜瓢,有白的,浅黄的,粉红的,淡紫的,落在地面上,落在戴车匠的脚上,很好看。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,一个一个,小傻子似的,聚精会神,一看半天。”这里,把戴车匠的工作写得有声有色,有颜色,有味道,有形状,还有一个个“傻”孩子的烘托,这是一幅多么丰满美妙的画面,在描写中突出了一种情调,在情调中让读者看到戴车匠的秉性,能从中想象出主人公的心理。然后写了戴车匠未泯的童心,为了让孩子们快乐,养了一窝洋老鼠,为孩子们制作了弹螺蛳壳的竹弓竹箭,当然也为了生计。

看到这里,读者并未感觉到一个什么完整的情节,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状态的描写,在描写中突出了作者的审美情调,让读者在阅读中也感受到了与作者一样的快乐。

汪先生生活在东大街,这里有他熟悉的人事物景,许多元素成了他作品中的原型。《戴车匠》亦如此。

小说是可以虚构的。《戴车匠》中有较大篇幅的虚构,如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,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,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。又如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,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。再如戴车匠眯着眼睛看他儿子吃螺蛳,用弓箭把螺蛳壳用力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,若有所思。他在想什么呢?想儿子的将来,想到这门手艺能否传承下去。

汪曾祺1939年远离家乡,直到四十二年后才回家,他从没见过戴车匠的独生儿子,怎能看到戴车匠为独生儿子养的一窝洋老鼠和特制的竹弓竹箭?这一切的描写,该都是虚构的,然而又是合理的,并且也可能是真实的,只是汪先生是没有见过的。虚构所需要的细节描写是植根于生活的,不然,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。

其实,许多事情,见过与没见过,虚构与非虚构,都不重要。因为对于汪曾祺来说,这里的景物人事烟火氛围,都已装在他的心里,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活水源头。